

美國醫學模式轉變的跨文化審視 ——兼評 Jeffrey P. Bishop 西方 醫學模式轉變觀念

王洪奇

醫學模式就是醫學觀，是人們對於醫學的總體看法和一般觀點。醫學模式直接影響著醫務工作者對於疾病和健康的最根本的認識，體現在診斷、治療和康復等各個環節，反作用於醫學教育和醫學人才培養，影響到醫學門類各個學科發展，甚至影響到國家和政府對於公共衛生政策的制訂。

就 Bishop 的文章〈從“生物醫學模式”到“生物社會心理精神醫學模式”——西方醫學史的教訓〉(Bishop, 2015)來看，儘管標題是以整個西方國家的醫學為其研究範圍，但是從文章的內容看則主要分析了美國醫學模式的演變，從基督教文化視角批判了醫學模式演變過程中存在的“科學主義”(scientism)，告誡非西方國家醫學發展應汲取教訓。文章充分體現了 Bishop 堅定的基督教信仰。

文章首先分析了美國“科學醫學”(即生物醫學)的出現，重點介紹了 19 世紀晚期創立的美國醫學聯合會(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及其在 1904 年成立的醫學教育專業委員會(the Council on Medical Education, CME)在規範美國醫學專業

王洪奇，山西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中國太原，郵編：030001。

《中外醫學哲學》XIII:2 (2015 年)：頁 127-130。
© Copyright 2015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教育方面做出的傑出貢獻，介紹了“弗萊克斯納報告”(Flexner Report, 1910)的重要意義。其實，除了 AMA 對於美國醫學教育的科學化產生最重要影響以外，從美國醫學與整個西方醫學的關係的視角看，美國生物醫學的建立與歐洲醫學直接相關，特別是在生物學和實驗醫學兩個基礎領域。另外，1893 年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創建了醫學院，該醫學院的創建對美國生物醫學模式的確立有直接推動作用。它使美國的醫學建立在生命科學基礎之上，使生物醫學逐漸佔據美國醫學主導地位，並逐漸使美國醫學教育科學化，醫療實踐規範化。

從哲學層面看生物醫學屬於機械論和還原論醫學。機械論和還原論醫學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遠非 19 世紀的產物。正如 Bishop 所指出，這種醫學哲學思潮可以追溯到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笛卡爾的二元論將醫學發展引向錯誤道路，即醫學僅僅關注人的肉體，靈魂問題則留給教會去考慮。在笛卡爾之後，偉大的牛頓是研究機械運動的物理學家，由於他在力學（專門研究物體機械運動的形式及其規律的學科）領域的偉大成就，他的理論對於物理學其他學科，對醫學和自然科學各個領域，乃至對後來的人文社會科學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的研究方法成為各個學科爭相效仿的方法。所形成的機械論觀點對其他學科產生了不良影響。18 世紀機械論和還原論在醫學領域的代表人物是法國醫生 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其代表作是 1748 年匿名出版的《人是機器》。18 世紀中期的醫學建立在力學（機械論）基礎之上，沒有區分有生命的世界（生理學的研究領域）和無生命的世界（物理學研究領域）這兩個世界的本質區別。隨著生命科學的發展，19 世紀後半葉，醫學的基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醫學“範式”(paradigm)從力學拓展到以生命科學為主，包括化學、物理學等學科在內的整個自然科學，形成了生物醫學模式。但是，由於還原論和機械論是一切自然科學最基本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因此生物醫學的還原論和機械論特徵一直保持了下來。

在 Bishop 看來，無論是生物醫學模式(biomedical model of medicine)，還是生理心理社會醫學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medicine)，甚至生理心理社會靈性醫學模式(biopsychosociospiritual model of medicine)，機械論和還原論思維方式依然是其基本特徵，只不過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特別是生命科學的發展，醫學的機械論和還原論思想也在變化，從器官到組織到細胞到基因，還原的層次逐漸深化。這是 Bishop 所說的西方醫學的第一個教訓。它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不把患者作為主體的人來看待，而把患者僅僅看作是一個可以還原為各個組成部分的生物體。

Bishop 所提及的西方醫學的第二個教訓是美國醫學發展的不斷世俗化。在生物醫學階段，醫學開始越來越明顯地走向科學主義道路。科學主義者認為採用科學方法就可以解決所有一切的人類問題。在醫學領域的表現，科學主義者的信念是人的肉體、患者的心理以及社會環境，處於其中的患者遭遇疾病、病痛和衰弱的痛苦和折磨，所有這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採用科學方法很好地理解。

作為虔誠的東正教徒，Bishop 從基督教視角看到的是科學主義所導致的整個醫學領域的碎片化過程。他指出了生物醫學的缺陷，這個缺陷就是只看到軀體(body)、器官、組織、細胞、基因，而沒有看到患者這個獨一無二的人(person)。生物醫學發展到 20 世紀 60 年代，生物醫學的缺陷越來越明顯地表露出來。醫生面對身心疾病的患者時，往往表現出生物醫學的冷酷、非人化、獨斷和機械特徵。

Bishop 在文章中指出，針對生物醫學模式的缺陷，發起第一次改革運動的是三位基督教神職人員：Joseph Fletcher，Paul Ramsey 和 Richard McCormick，被 Bishop 稱為“基督教三傑”。他們分別是基督教不同教派的神父、牧師或神學家，他們從各自的教派出發，批判生物醫學技術濫用和非人性特徵，試圖通過引

入生命倫理學(Bioethics)把基督教教義再次引入醫學領域，解決醫學終極問題，挽救醫學不使其繼續迷失終極目標和意義。但是由於神學語言受到醫務工作者的強烈排斥，神學聲音很快被弱化，宗教被邊緣化。

Bishop 還介紹了美國生物醫學模式的其他幾次轉變，並認為這幾次模式轉變都是失敗的，生理心理社會靈性醫學模式是“最後的瘋狂”。緣由均是醫學世俗化，科學主義、技術主義的過度膨脹所導致的醫學的非人化。在他看來當代西方（美國）醫學，已經完全喪失了其本應具有的終極目的性。

Bishop 把醫學模式變革都看作是失敗的，都是教訓。但是 Bishop 並沒有明確指出一條走向成功的道路。生物醫學模式必須要改變，在文章的最後 Bishop 提出的建議（這或許也是生物醫學模式變革的出路）是：創建不同信仰的醫學。按照作者的建議，中國可以有自己的醫學，如佛教醫學(Buddhism Medicine)、道教醫學(Daoism Medicine)、儒教醫學(Confucian Medicine)，以及中國特色基督教醫學(Chinese Christian Medicine)，以免受到西方生物醫學模式影響，而不需要考慮醫學模式轉換。這條道路看起來美好，具體行走起來卻不容易。其實，中國早就存在著這樣具有中國特有文化傳統的醫學，中醫中所包含的思想或許就是文章作者所期望的願景。

參考文獻

- 傑佛瑞·彼索普：〈從“生物醫學模式”到“生物社會心理精神醫學模式”——西方醫學史的教訓〉，載范瑞平編，《中外醫學哲學》，2015年，第13卷，第2期，頁89-118。Bishop, Jeffrey P. “From Biomedicine to Biopsychosociospiritual Medicine: A Lesson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W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edited by FAN Ruiping, 13:2(2015), pp.89-118.